

福利政治的运用与沙特王国什叶派政治斗争的转变*

◎ 李国强

内容提要：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异，沙特王国的什叶派长期遭受官方宗教和沙特政府的歧视。20世纪50年代起，什叶派掀起了权利解放的斗争。什叶派的权利斗争始于经济层面的抗争，逐步过渡到政治层面的权利诉求，甚至提出了自治乃至独立的要求，遭到沙特政府的打压。面对什叶派的权利抗争，沙特政府长期进行刚性压制，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双方关系出现和解态势，沙特政府部分承认了什叶派的身份地位并赋予其一定政治权利，且更多采用福利政治等柔性手段处理同什叶派的纷争。福利政治的成效显著，它不仅推动了什叶派同沙特政府的和解，也维护了政治的相对稳定，更强化了什叶派对沙特王国的政治认同，因而福利政治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沙特王国什叶派政治斗争的转变。

关键词：沙特王国 福利政治 什叶派 权利解放

作者简介：李国强，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2010年中东变局以来，很多中东国家陷入了政治动荡或发生政权的更替，而政治制度较为保守的沙特王国却保持了政治的相对稳定，尽管也发生过什叶派的抗议活动，但其规模和影响力远远未能冲击到现存的政治秩序。很多学者对影响沙特王国政治稳定性的因素进行解读，也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福利同沙特王国政治稳定性的关系，但尚未有学者对王国的福利政治问题进行过系统研究。随着中东什叶派的崛起，许多学者对沙特王国的什叶派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对于什叶派同沙特王国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并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论断，但较少有学者论述过福利政治在沙特王国什叶派权利解放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鉴于什叶派及福利政治在沙特王国政治生态中的重要性，对相关问题的整理和论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既对什叶派的权利斗争作一个整理，也提供了一个研究沙特王国乃至中东国家政治问题的新视角，即福利政治。

一、什叶派的不满与抗争

沙特王国的什叶派是中东地区什叶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集中于沙特王国的东部省区，“什叶派穆斯林占东部人口总数的55%”。^① 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异，沙特王国的什叶派长期遭受瓦哈比派伊斯兰教（Wahhabi）的歧视，“逊尼派领袖一直宣称对什叶派使用暴力并消除沙特国内的什叶派力量”。^② 沙特王国以宗教立国，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为沙特家族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沙特政府依赖官方宗教且在宗教政策上同后者保持一致，因而什叶派的政治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什叶派问题还因中东的地缘政治而变得复杂，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对外输出革命，沙特王国的什叶派曾在伊朗的影响下举行游行示威，沙特王国同伊朗长期的对抗关系也影响到了国内的什叶派地位。

* 本文为2023年自治区“天池英才”项目、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培育项目成果（编号：23CPY037）的阶段性成果。

① John R. Bradley, *Saudi Arabia Exposed inside a Kingdom in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78.

② Toby C. Jones, "Saudi Arabia Versus the Arab Spring", *Raritan*, Vol.32, No.2(Fall 2011), p.55.

（一）沙特政府的歧视政策引发什叶派的权利抗争

沙特王国的什叶派长期遭受政府和官方宗教的歧视，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受到不公正对待：政治方面，什叶派长期被排斥于政治体制之外，政府限制其政治参与，“瓦哈比派伊斯兰教非常歧视什叶派，高级乌莱玛委员会中的 20 名乌莱玛没有一个是什叶派……协商委员会 150 名成员中，仅有 3 名是什叶派。部长、副部长、省区长官、省区副长官和东部省区长官中没有人属于什叶派”；^① 经济方面，尽管什叶派聚居的东部省区是沙特王国石油资源的主要产地，但沙特政府长期忽视这里的经济发展，“从 20 世纪 80 年代沙特政府对东部省区投资情况以及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政策可以反映出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歧视，尽管这里的石油工业发达，但是政府对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上心”。^② 什叶派的职业选择也受到诸多限制，很多工作不对什叶派开放，众多什叶派只能充当阿美石油公司的下层工人，工资待遇相对较低，经济层面的什叶派精英屈指可数；宗教方面，官方宗教长期拒绝承认什叶派的身份地位，“即使到今天，很多当地学校依然向什叶派学生灌输其宗教信仰属于伊斯兰教的变种，是犹太人企图分裂穆斯林的阴谋”。^③ 沙特政府限制什叶派的宗教活动，“政府不允许什叶派公开庆祝自己的节庆活动，不允许他们建立清真寺，不允许他们公开表露自己的信仰”；^④ 文化教育方面，沙特政府长期漠视什叶派文化的发展，阻碍其文化建构和文化认同，忽视什叶派教育的发展，“在沙特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瓦哈比主义一统天下，什叶派历史和文化完全被排除在外……政府禁止什叶派出版有关自身历史或文化的著作”。^⑤ 此外，沙特政府也不重视什叶派的教育，教育内容很少涉及什叶派历史，什叶派教徒无法把控教育发展的方向，例如“在什叶派人口密集的哈萨地区(al-Ahsa)，200 名女校校长中没有一个人是什叶派，而 200 名男校校长中仅有 15 名什叶派成员”^⑥。

沙特政府的歧视和压制受到什叶派的强烈抵制和反抗。什叶派的权利斗争始于经济层面，体现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争取经济权益的斗争，这源于什叶派自身低下的经济地位和日益恶化的工资待遇。沙特王国的精英阶层控制经济命脉，普通民众经济地位低下，而什叶派民众经济状况更为恶劣，他们一般充当阿美石油公司的底层工人，社会地位低下且工资福利待遇差，其生活处境日益恶化，因而急切希望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1953 年阿美石油公司工人举行第一次罢工和游行示威，要求成立工会并增加工人的工资。1956 年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举行第二次罢工，除了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外，还提出了反帝的要求。这一时期什叶派的抗争主要在于经济层面，两次罢工的主题都以经济问题为主，斗争的形式体现为和平的游行示威，但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工人的抗争有向政治层面过渡的趋向，“1953 年的罢工，主要局限于经济层面和福利性要求，相比之下，1956 年罢工期间，石油工人的要求开始从经济层面延伸到政治层面”。^⑦

（二）什叶派的权利抗争具有鲜明的暴力色彩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沙特王国什叶派的权利诉求从经济层面转向政治层面，

① Elie Elhadj, “The Shi’i Crescent’s Push for Regional Hegemony and the Sunni Reaction”, *Meria Journal*, Vol.18, No.1(Spring 2014), p.43.

② Al-Rasheed Madawi, Al-Rasheed Loulouwa, “The Politics of Encapsulation: Saudi Policy towards Tribal and Religious Opposi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32, No.1(Jan 1996), p.111.

③ John R. Bradley, *Saudi Arabia Exposed inside a Kingdom in Crisis*, p.81.

④ Toby C. Jones, “Saudi Arabia Versus the Arab Spring”, p.55.

⑤ 李福泉：《沙特什叶派问题探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

⑥ Elie Elhadj, “The Shi’i Crescent’s Push for Regional Hegemony and the Sunni Reaction”, p.43.

⑦ 哈全安：《中东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793 页。

这是什叶派自身政治觉醒的结果，同时也与外部政治环境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给沙特王国的什叶派很大鼓舞，而伊朗对外输出革命的做法也迎合了他们的政治需求，他们效仿伊朗，谋求自治甚至政治的独立。在伊朗的鼓动下，东部省区的什叶派被广泛动员起来，1979年，东部省区的什叶派公开庆祝传统阿舒拉节，受到沙特政府的阻挠。民众最初采用游行示威等和平方式表达诉求，但示威民众同沙特军警发生冲突，随后和平的游行示威转向暴力抗争，“游行迅速遍布东方省全境，并袭击英国——阿拉伯银行，焚烧汽车，捣毁商店”，^①“1980年在霍梅尼返回伊朗一周年之际，什叶派再度爆发大规模游行，并演变为骚乱”。^②激进的什叶派民众主张效仿伊朗，谋求政治自治，甚至要求推翻沙特家族的统治。

这一时期什叶派的政治斗争带有很明显的暴力色彩，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什叶派的暴力抗争是对沙特政府刚性统治手段的回应。20世纪80年代之前，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统治方式较为单一，一方面漠视什叶派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另一方面则粗暴回应什叶派的权利诉求，依靠暴力机器蛮横镇压什叶派的和平游行示威，较多诉诸刚性手段。80年代之前，什叶派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什叶派民众对政府愈发失望，其斗争内容从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的转移既反映了其政治意识的觉醒，也昭示着其斗争方式的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和平的游行示威；第二，什叶派权利斗争的激进转向也与外来激进思想的传入有关。冷战时代，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各种激进思想蔓延，这些激进思想不可避免地传入沙特王国，“在阿美石油公司劳工住宅区、新兴的石油城镇达曼和朱拜勒以及什叶派聚居的港口城市卡提夫，到处蔓延着激进的政治思潮”，^③久经压迫的什叶派民众如遇甘霖，这些激进思想为什叶派政治斗争提供了指引；第三，什叶派民众的暴力抗争也有很大的伊朗因素。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多次批评君主制度，认为其同伊斯兰教不符，认为君主制度是舶来品，称沙特的君主制度是一种倒退”，^④伊朗对外输出革命并鼓动沙特王国东部省区的什叶派反抗沙特政府，号召他们用暴力推翻本国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什叶派权利抗争的暴力色彩。

二、沙特政府对什叶派政策的转变

面对什叶派的权利抗争，沙特政府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以刚性手段为主向柔性手段过渡的过程。大体说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沙特政府侧重运用刚性手段，之后沙特政府与什叶派走向和解，更倾向于运用社会福利等柔性手段，即便诉诸刚性手段解决什叶派问题，但也往往配合使用社会福利措施，以达到最优的政治效果。

（一）20世纪80年代之前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政策以刚性手段为主

在沙特王国的建立过程中，开国君主伊本·沙特展现了对什叶派的宽容，禁止瓦哈比派战士毁坏什叶派圣墓和屠杀什叶派。王国建立后，尽管沙特政府对什叶派政策的暴力色彩逐步弱化，但沙特政府一直保留着刚性手段。沙特政府的刚性手段首先体现为对什叶派领导人的强硬态度。为了防止什叶派领导人进行宣传鼓动，沙特政府严密监视什叶派领袖，逮捕持异议者，甚至对他们处以死刑的惩戒。其次，沙特政府的刚性手段还表现为对什叶派政治活动的严厉镇压。1979年什叶派的抗议活动发生后，“沙特政府对东部省区的什叶派实行最为残

① 李福泉：《沙特什叶派问题探析》，第56页。

② 艾林：《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93页。

③ Toby Matthiesen, "Migration, Minorities, and Radical Networks: Labour Movements and Opposition Groups in Saudi Arabia, 1950-1975", *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Vol.59, No.3(Dec 2014), p.478.

④ W. G. Schwanitz, "Iran's Rivalry with Saudi Arabia between the Gulf Wars", *Middle East Policy*, Vol.10, No.3(Fall 2003), p.181.

酷的镇压……沙特政府派遣了其国民卫队，野蛮解散抗议活动，第二年卡提夫的什叶派在阿舒拉节当日遭到直升机的疯狂扫射，很多人被射死、射伤”。^①

沙特政府长期对什叶派实行刚性的统治方式，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基于宗教因素考量，瓦哈比派伊斯兰教长期歧视什叶派，政教合一的国家性质以及瓦哈比派伊斯兰教在沙特王国国家治理中的重大作用都决定了沙特政府必然采取同瓦哈比派一致的政策，即对什叶派进行压制。受限于意识形态和特殊的政治对抗模式，沙特政府更多采用刚性的对抗手段；其次，沙特政府长期固守刚性手段还在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沙特政府柔性手段的不完善，特别是福利政治的不成熟。沙特王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趋于完善，而福利政治的成熟更为延后，这就决定了沙特政府无法精巧地运用福利手段，而是固守对抗和博弈的思维模式；第三，沙特政府刚性手段的运用也是对国内外政治环境的一种回应。从国内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沙特王国国内政治并不太平，工人抗议频仍，针对沙特王室的暗杀层出不穷，而恐怖袭击、武装颠覆等事件更是有增无减。鉴于此，沙特政府只能运用刚性手段相应对，这种思维和处理方式也转移到对什叶派的政策上。从国际看，冷战时期的特殊国际环境强化了对抗模式，而地区政治的不稳定也刺激了刚性手段的运用，特别是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对外输出革命的现实情况也加重了沙特政府同国内什叶派的对抗，这就决定了沙特政府刚性手段运用的长期性。

尽管沙特政府的刚性手段时常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然而刚性手段的运用确也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成效，刚性手段是促使什叶派斗争目标理性化的重要原因。沙特王国的什叶派曾希望效仿伊朗，实现自治的诉求，然而沙特政府长期对什叶派实现刚性压制，在沙特政府的持续打压下，老牌强硬派沙特真主党（Hizbullah al-Hijaz）最终走向消亡，“政府对沙特真主党持续打压，加上1997年伊朗穆罕默德·卡塔米（Muhammad Khatami）上台后同沙特关系缓和，这些都导致沙特真主党的消亡”。^②在刚性手段的压制下，什叶派的政治斗争目标也趋于理性化，主流什叶派放弃了推翻沙特政府这一不切实际的要求，而是希望在现存政治框架下谋求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现在他们不再要求伊斯兰革命，不再诉诸于军事措施和极端主义手段，不再批评政府的专制统治，而是更多指责政府对人权的侵犯，要求尊重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③刚性手段无疑在什叶派政治斗争目标的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20世纪80年代之后沙特政府同什叶派的关系逐步缓和

20世纪80年代后期沙特政府同国内什叶派的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这首先表现为双方政治的妥协，沙特政府不再单一诉诸刚性手段，而是通过多种途径改善同什叶派的关系，应对手段更为多元化，双方政治关系出现和解迹象。沙特政府主动改变强硬姿态，同什叶派政治代表进行协商，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双方的争端，“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沙特政府派代表同国内和流亡国外的什叶派进行会谈，允诺会保证他们的安全，前提是他们放弃敌对活动”。^④沙特政府不仅展现出和解的姿态还诉诸于行动，政府释放多名什叶派政治犯以及游行示威的民众，1993年沙特政府对本国什叶派穆斯林实行特赦，释放了被关押的什叶派领袖，

^① John R. Bradley, *Saudi Arabia Exposed inside a Kingdom in Crisis*, pp.81-82.

^② Toby Matthiesen, "Hizbullah al-Hijaz: A History of the most Radical Saudi Shi'a Opposition Group", *Middle East Journal*, Vol.64, No.2(Spring 2010), p.179.

^③ Al-Rasheed Madawi, Al-Rasheed Loulouwa, "The Politics of Encapsulation: Saudi Policy towards Tribal and Religious Opposition", pp.113-114.

^④ John R. Bradley, *Saudi Arabia Exposed inside a Kingdom in Crisis*, p.82.

并允许流亡海外的什叶派领袖回国。双方政治和解的重要步骤是沙特政府部分允许什叶派的政治参与,以满足他们的参政愿望。2005年沙特政府首次允许什叶派参加全国市政委员会的选举,“什叶派代表赢得了卡提夫和哈萨两地市政委员会12席中的11席,尽管委员会权力有限,但选举本身第一次为什叶派参与地区事务和公开讨论什叶派问题提供了合法渠道”。^①

在逐步实现政治和解的同时,沙特政府还部分改变了对什叶派的宗教歧视政策,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宗教宽容的诚意。尽管在国家治理上沙特政府仍然依赖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但90年代以来,沙特政府的宗教政策越来越灵活,对什叶派的宽容度也越来越高。沙特政府的宗教宽容政策首先表现为对什叶派宗教身份的部分认同,“沙特政权重新发行学校教科书,修改了曾经关于‘什叶派是极端教派之一’的提法。新的教科书提到沙特阿拉伯现有5个伊斯兰教法学派,其中4个属于逊尼派,另一个属于什叶派”。^②此外,沙特政府还部分默许了什叶派的宗教活动,允许什叶派庆祝阿舒拉节,并对什叶派正常的宗教活动进行保护。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这是什叶派长期斗争的结果。自20世纪50年代起,为赢得自身权利解放,什叶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沙特政府无法全然漠视什叶派的生存状况,也无法一味压制什叶派的正常权利诉求,且什叶派自身蕴藏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国家并没有提供给什叶派和逊尼派同等的发展基金和福利待遇,什叶派发展出半自主的公民社会,包括严密的社区网络和村社网络,同时创建了一个泛什叶派的网站——拉希德(Rasid)”,^③什叶派在政治觉悟、政治联合和政治动员方面都强于沙特王国的逊尼派民众。近年来,随着中东什叶派的崛起以及联合趋势,沙特本国的什叶派集聚了更强的政治能量,“沙特政府担心什叶派可能同外部采取联合行动,因而重启同什叶派的谈判,赋予他们更多宗教权利和人身自由”。^④

其次,沙特政府对什叶派政策的软化还说明了单纯依赖刚性手段的局限性,也意味着沙特政府将更多采用社会福利等柔性手段处理与什叶派的纷争。尽管刚性手段促使什叶派激进主义的消亡,但却无法消弭什叶派权利诉求。沙特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单纯的暴力压制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因而更加倾向于福利政治等非暴力方式解决两者的纷争。80年代后期什叶派的权利诉求更加理性,也展现出和解的姿态,这也是沙特政府政策软化的重要原因,“大多数什叶派抗议者的目的是寻求平等的地位并获得政府的认同,并非推翻沙特政府,什叶派力求在沙特政府框架范围内寻求更多自治权利,这也是沙特当局愿意同什叶派代表相沟通的原因”。^⑤

再次,沙特政府对什叶派政策的软化也是对复杂国内外局势的研判和应对之举。从国内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政府面临着国内逊尼派改革者以及极端主义分子的挑战,“海湾战争后,因不满王室邀请美军进驻沙特,逊尼派反政府力量迅速崛起,成为沙特政权的最大威胁”,^⑥沙特政府疲于同时应对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挑战,因而不得不部分满足什叶派的正常诉求,改变一味的镇压方式。从国际看,90年代以后伊朗停止了对外输出革命的政策,沙特王国同伊朗的关系也逐渐缓和,沙特政府对本国什叶派的政治恐惧有所减缓,且“国际社

① 艾林:《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第92页。

② 吴彦:《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思潮与运动》,《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

③ Toby Matthiesen, “A Saudi Spring: The Shi’a Protest Movemen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2011–2012”, *Middle East Journal*, Vol.66, No.4 (Autumn 2012), p.631.

④ John R. Bradley, *Saudi Arabia Exposed inside a Kingdom in Crisis*, p.83.

⑤ Maximilian Terhalle, “Are the Shia Rising”, *Middle East Policy*, Vol.14, No.2(Summer 2007), p.71.

⑥ 艾林:《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第91—92页。

会指责在瓦哈比派占主导的沙特王国缺乏宗教信仰自由，面对国际压力，沙特政府作出了一些改变”^①。

三、福利政治的运用及效果分析

20世纪80年代之后，沙特政府同什叶派的关系逐步缓和，沙特政府也改变了单一的镇压策略，更多采用柔性手段处理什叶派问题，社会福利手段的运用即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起，沙特政府在全国推行社会福利，70年代沙特王国迈入石油经济时代，在石油美元的带动下，沙特王国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出于维护政治统治的现实需要，沙特王国的社会福利逐步政治化，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福利政治模式。

（一）20世纪80年代之后沙特政府对什叶派更多运用福利政治的手段

沙特政府推行的社会福利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首先，从沙特王国推行社会福利的出发点和动机来看，尽管也有“造福民众”之考量，但其深层的政治动机也昭然若揭，“沙特统治者向民众提供舒适的政府工作岗位、巨额的财政补贴、免费的住房。这些政策的实施，长期以来是要换取民众对沙特政权的服从”。^②其次，沙特王国社会福利的推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如偏袒王室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行为，“社会福利项目并不能全部得到落实，政府存在腐败问题，福利资金以政府合同的形式回流到沙特王室的腰包”。^③即使在石油经济发展不景气年代，沙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国内的社会福利开支，但却丝毫不触及王室及精英阶层的利益。再次，沙特王国推行的社会福利缺乏制度约束，其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统治阶层的意愿。这就不难理解每逢新国王继位，民众总能得到诸如红包之类的福利，而政治紧张时期，民众的社会福利待遇要优于寻常时期。

沙特政府长期忽视什叶派聚居区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之前，沙特王国的社会福利政策也未能覆盖至什叶派聚居区。尽管什叶派聚居的东方省是沙特王国最主要的石油产地，但这里的基础设施落后，什叶派无法分享石油经济发展的成果。随着石油经济的发展，王国其它地方迅速实现了城市化和现代化，而什叶派聚居区城市化和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其它地区。很多什叶派民众是阿美石油公司的蓝领工人，他们大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工资福利待遇较差，生活条件无法同逊尼派相提并论。尽管沙特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曾做出过提高什叶派经济待遇的承诺，但什叶派民众的生活却没有明显改善。

20世纪80年代之后，沙特政府有意识地利用福利手段笼络什叶派民众，通过福利手段获取什叶派的谅解和支持。沙特政府社会福利的覆盖范围首先扩至什叶派聚居区基础设施的建设。1979年什叶派抗议发生之后，沙特国王曾到访过什叶派聚居区，并许诺改善那里的经济状况，“（1979年）12月初卡提夫当地政府拨款7亿美元用于建立一套新的排污系统……12月11日，政府拨款39000万用于改建卡提夫的街道。政府对哈萨也采取了类似政策，同一周，当地官员宣布提供10亿美元用于各项工程建设”。^④20世纪以来，什叶派聚居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政府开始制定和实施提高什叶派穆斯林生活的计划，包括铺设道路、重修街

① John R. Bradley, *Saudi Arabia Exposed inside a Kingdom in Crisis*, p.79.

② Hugh N. “Saudi Arabia is Reeling from Falling Oil Prices, and it could Get Much Worse”, *The Washington Post*, 2016-02-26.

③ Moses N. Kiggundu, Chris Smith, Aareni Uruthirapathy, “Competitiveness of Monarchies and Republic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Reg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F*, Vol.11, No.2(2013), p.277.

④ Toby Craig Jones, “Rebellion on the Saudi Periphery: Modernity, Marginalization, and the Shia Uprising of 1979”, *Middle East Study*, Vol.38, No.2(May 2006), p.228.

道、新建学校和医院等多项工程。政府还通过房地产开发基金，向修建住房的什叶派城镇居民提供住房贷款”。^① 2010年中东变局以来，迫于政治压力，沙特政府加速了什叶派聚居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沙特政府还为什叶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沙特政府为数以百计的什叶派提供公司职位”。^② 20世纪80年代之后，沙特政府同阿美石油公司合作，联合培养什叶派员工，很多什叶派员工成长为高级职员，有的人迈入中产阶级行列，沙特政府也着重培养更多的什叶派中产阶层以弱化什叶派的政治激进倾向。近年来，沙特王国的经济出现下行态势，什叶派青年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和缓解政治压力，“2011年2月23日及3月中旬，国王宣布向民众提供大量的社会福利项目，解决青年人失业和住房问题。政府额外追加1200—1300亿美元，受惠者包括什叶派和逊尼派”。^③ 福利补助是沙特政府重要的政治手段，在维护王国政治稳定方面意义重大，在应对突发性的政治危机方面效果更佳。中东变局以来，沙特政府提高了本国的福利补助项目，而什叶派也被包含其中。

（二）福利政治的推行取得了积极的政治效果

福利政治既是沙特政府同什叶派关系缓和的表现，又是两者关系逐步和解的原因。福利政治的运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福利政治的成效之一是推动了什叶派同沙特政府的和解，福利政治是什叶派由斗争转向合作、由激进转向温和的重要原因。所谓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20世纪80年代之前沙特政府的刚性压制并没有消弭什叶派的权利诉求，因压制带来的怨恨情绪反而导致什叶派对沙特政府的敌对态度。80年代之后，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社会福利待遇不断提高，在福利政治的推动下，什叶派自身权利斗争发生了很大改变。80年代之后，什叶派的政治斗争出现温和化的趋势，主流什叶派都主张同政府和解。90年代，什叶派最大的政治组织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改名为什叶派改革运动，体现了其改革和合作意愿，其领导人哈桑·萨法尔（Hassan Safar）“强调什叶派政治参与以及与政府对话的重要性……要求进行社会政治改革、扩大政治参与、发展公民社会、以及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④。福利政治的运用也推动了什叶派激进力量的分化，曾经最激烈的反政府组织沙特真主党解散后，一些真主党的前领导人逐步同沙特政府达成和解，“一些前真主党领导人例如阿卜杜拉·卡里姆·奥·胡拜勒（Abd al-Karim al-Hubayl）效仿沙特革命组织，逐步同政府达成和解……其他领导人，例如侯赛因·奥·拉迪（Husayn al-Radi）参加了政府主导的国民对话”。^⑤

福利政治的第二个效果是维护了政权的稳定，这也是沙特政府在中东变局中保持自身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中东变局发生后，沙特政府提高了什叶派的福利待遇，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什叶派民众的紧张关系，什叶派民众也给予积极回应。以什叶派的抗议活动为例：除少数激进分子外，“大多数什叶派并没有同政府采取敌对措施”，^⑥ 什叶派民众的抗议规模及政治影响都相对有限，“与其他国家抗议活动相比，东部省区什叶派的抗议活动十分有限。沙特政府采取了刚性的强硬措施、许诺改革并向什叶派民众分发社会福利，种种措施暂时使大部分民众保持了克制”。^⑦

① 艾林：《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第91页。

② John R. Bradley, *Saudi Arabia Exposed inside a Kingdom in Crisis*, p.82.

③ Toby Matthiesen, “A Saudi Spring: The Shi’a Protest Movemen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2011–2012”, p.636.

④ 吴彦：《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思潮与运动》，第24页。

⑤ Toby Matthiesen, “Hizbullah al-Hijaz: A History of the most Radical Saudi Shi’a Opposition Group”, pp.195–196.

⑥ Sherifa Zuhur, *Saudi Arabia*, Santa Barbara: ABC-CLIO, LLC, 2011, p.194.

⑦ Toby Matthiesen, “A Saudi Spring: The Shi’a Protest Movemen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2011–2012”, p.637.

福利政治第三个效果是增进了什叶派民众对沙特王国的政治认同，这也是福利政治最深远的影响。在福利政治的干预下，什叶派民众越来越强调国家的归属感，政治认同感越来越强，甚至在政治危机中保持着对国家的忠诚。例如海湾战争期间，沙特王国的什叶派就拒绝同萨达姆政治合作，保持了政治克制。什叶派精英分子甚至宣传爱国主义，“90年代末，什叶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以民主政治、人权和公民社会为核心，同时更加强调伊斯兰教和他们对祖国沙特阿拉伯的绝对忠诚，还将沙特民族主义融入到他们的政治言论中”。^①

四、结语

福利政治丰富了沙特政府的政治统治方式。威权政治模式下，统治阶层更倾向于运用暴力压制等刚性手段，政治统治方式相对单一且效果不佳。福利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统治手段，使沙特政府的执政方式更为多元和灵活。当前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统治方式是多元的，在政治和解的大背景下，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政策外在展现为柔性的政治统治方式，体现为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项目。然而，沙特政府并没有彻底抛却暴力镇压等刚性手段。为应对中东变局下什叶派的抗议活动，政府一方面提高什叶派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也动用武力，镇压什叶派的抗议活动，逮捕什叶派抗议民众，应正确把握沙特王国政治统治方式的双重性。

有两点需要进一步思考：第一，应客观公正地把握福利政治在沙特王国政治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尽管当下沙特王国侧重使用社会福利等柔性手段，但始终以刚性手段为依托，压倒性的相对实力以及刚性手段的运用是沙特王室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和保持政治相对稳定的最主要原因。福利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紧张的政治局势，促使政治局势向利好的方向发展，然而沙特政府却无法仅凭社会福利维系统治。很多西方学者对社会福利的作用过分夸大，认为社会福利是中东乱局中沙特王国保持政治稳定的主要原因，这种提法显然有失公允。

第二，应客观审视沙特王国什叶派的权利解放运动，不可过于乐观。当下，尽管沙特王国的社会福利逐步惠及什叶派，什叶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利，然而什叶派的权利解放之路却并不乐观，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首先，什叶派的权利解放很容易受到国内外政治斗争的冲击。尽管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政治、宗教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但是王国保守的宗教势力仍然敌视什叶派，“什叶派是极端主义的瓦哈比教徒（如‘基地’组织及其支持者）所深恶痛绝的，而什叶派与沙特政权的和解更使他们无法忍受”。^② 沙特政府很难调和教派之间的冲突，如果两者裂痕加大，沙特政府将很难扮演一个客观公正的调停人角色。此外，沙特王国的什叶派问题很难摆脱伊朗因素和教派冲突的嫌疑，“沙特王室不是把什叶派问题看作局限于国内的社会政治问题，而是视为与外部势力（伊朗）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③ 什叶派问题的扩大化让未来的权利解放之路充满更多不确定性。再次，尽管福利政治在改善沙特政府和什叶派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石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沙特王国在各领域酝酿去福利化的改革，如果去福利化的改革大幅度削减什叶派所获得了社会福利，势必会引起他们的反抗，也无疑会弱化社会福利的积极政治功效且损害两者的关系。

（责任编辑 王伟）

① 吴彦：《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思潮与运动》，第26页。

② 李意：《沙特什叶派与政府关系的流变》，《宗教与美国社会》2019年第1期。

③ 李福泉：《新千年沙特什叶派问题的演进与前景》，《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